

# 大轰炸中的伟人身影:周恩来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

丁英顺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同时,对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重庆成为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最长、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城市。

在重庆大轰炸中,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他们勇敢而坚定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

## “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

1938年10月,武汉3镇处于日寇的包围中,形势危急。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而新华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了坚持党的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正确主张,依然坚守在武汉。

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华社采取种种应变措施,即调动一部分人力、财力,先期至重庆筹备续版。一旦汉口不守,马上在重庆出版,不使党报中断一天。对于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了安排,每人预备一套军装,发了八路军徽章,一旦武汉失守就突围,徒步奔赴重庆。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当前的紧张局势很难充分、完善地实施相应计划和组织安排,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占的占,场面一片混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领导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不顾事务纷繁,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

10月22日,日寇逼近武汉,日机轮番轰炸,硝烟四起。下午4点,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社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办事处和新华社报社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行的还有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李延禄、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加拿大护士简·尤恩等。

“新升隆”是一艘小轮船,中共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运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社报社100余人以及全部器材。此时,船上已相当拥挤。当船尚未启航时,又有不少难民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能多装一人就多装一人”,同志们宁愿挤一点,也尽力满足难民的要求。

第二天下午3点多,“新升隆”轮行至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时,4架日机突然飞临上空,连投数枚炸弹,轮船不幸被击中,顿时起火。其后,日机轮番低飞,用机枪扫射。“新升隆”轮在火焰中渐渐下沉,船上伤亡80多人,其中新华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潘美年、项泰、李密林、李元清等25人不幸遇难。

周恩来在长沙听说“新升隆”轮被炸后,深感痛心。后来得知,“新升隆”轮被炸,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要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而专门组织了这次轰炸行动。万幸的是,周恩来躲过了这次劫难。

而此前的10月19日,周恩来就曾经在日机轰炸中遇险。

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九洲回忆,这一天,周恩来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去参加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半路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江面上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争相逃命。眼看一架日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刘九洲连忙拉住周恩来的手,要他赶快躲避。周恩来看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他一下子挣脱了刘九洲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呼啸而至,刘九洲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周恩来扑倒在地,和他一起滚下了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日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霎时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泥土把周恩来和刘九洲盖得严严实实。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刘九洲抬头一看,周恩来被埋在江堤的一个大坑里,人们把他从土中拉了出来,幸好安然无恙。

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社会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新华日报》保卫武汉殉难烈士追悼会,祭奠遇难烈士。重庆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有四五千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敬献挽联,周恩来的挽联是:“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邓颖超发表长诗《敬悼新升隆轮二十五位死难烈士》。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10余人在会上讲话,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决心。董必武在会场高呼:“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新升隆”轮被炸,是《新华日报》办报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但英勇的新华人并没有被吓倒。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在被炸后的两天即10月25日,就顺利与武汉《新华日报》完成交接,成为抗战烽火中没有中断过一期的报纸,创下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

## “我们是炸不走的”

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投降,日军在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城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其中,尤以“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

1939年5月3日下午1点起,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上百颗爆炸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昼夜不息。重庆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脸,5月4日下午6点,27架日机再次来袭,都邮街、小梁子、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大火延烧两日。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人。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美国、法国等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了“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塌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在这次大轰炸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城区驻地机房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工作人员只得连夜迁往重庆西北角的红岩嘴。

1940年5月的一天,日机空袭重庆,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听到空袭警报后,躲进了防空洞。不一会儿,日机飞行至红岩嘴上空盘旋,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日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了办事处前面的山沟里。警报解除后,大家回到办事处,发现大楼的墙壁被震坏了很大一块,非常气愤也很担心。这时,周恩来站到被震坏的大楼前面,坚定地对大家说:“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完,特意让办事处人员给他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照相留念。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时见到了这张照片,感慨道:“当年我和周恩来在这里拍照,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压不倒的!”

这一年,曾家岩50号周公馆也遭到轰炸。日机来袭时,周恩来正和郭沫若在房内谈话,听到警报后,赶紧和工作人员来到周公馆的防空洞躲避。突然,他们从防空洞的座位上被震下来。警卫员刘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赶紧从防空洞出来,正好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他赶紧叫大家灭火抢救文件。幸好发现得早,没有蒙受什么大的损失。

## “我们的防空洞随时为人民开着”

重庆大轰炸期间,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防

空力量十分薄弱,重庆军民只能采取消极防御,主要办法就是躲进防空洞。各机关、各单位以及大户人家,有条件的都要挖掘自己使用的防空洞。

红岩村地处当时重庆的郊区,但也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八路军办事处就在驻地大楼附近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并在洞口搭了席棚,种上藤萝植物作隐蔽。

由于物资奇缺,条件有限,红岩的防空洞并不十分宽敞。办事处人员自己用还凑合,可附近的一些群众,他们没有条件自己挖防空洞,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轰炸。这一来,洞里就更拥挤,空气也更浑浊,办事处的一些同志就不太乐意了。

周恩来听到有人抱怨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出现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没把这当成小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要与人民同甘共苦患难,为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代是如此艰难曲折,战争是如此残酷,人民是如此困苦,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还不能解救人民大众,心里已经很愧疚不安,而有些同志连防空洞都不愿与群众一起躲,仅仅是空间更拥挤些,这样的“牺牲”都不肯,岂不成了口头革命派。因此,他指出,我们的防空洞应该是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的。

此后,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只要他在场,每次躲空袭,都主动招呼群众进入办事处的防空洞,对有些行走不便的群众,还不顾安危,扶助他们进去。每次遇到日机空袭,办事处的同志在躲防空洞途中,往往会看到周恩来矫健的身影,站在农场的空地上指挥奔跑的人群。

饶国模的女儿刘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指挥大家躲防空洞的过程:

一次日机又来空袭,周恩来招呼完大家进洞后,看到办事处的房东、大有农场场主饶国模和女儿还在奔向防空洞的途中。饶国模身胖体重,奔走间已上气不接下气。周恩来赶紧跑过去,搀扶着她,轻声细语地说:“不要紧!慢慢走!不要摔倒了。”饶国模见是周恩来,就着急地说:“周先生,你不要管我。你快到防空洞

去!”周恩来仍然扶着她,并放慢了语音说:“不要慌!如果飞机到了头上就蹲下来不要动,现在飞机还没过来,可以走!”这样,饶国模也镇静下来,反而加快了步伐,顺利地进入了洞中。饶国模的眼睛中此时还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刚进防空洞,市区方向已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日机在分批盘旋投弹。周恩来嘱咐饶国模的女儿照顾好母亲,又交待陈家康维护洞内的秩序,接着就到洞口去站着,观察空中。不一会儿,日机来到红岩村上空盘旋,不久又在防空洞不远的山坡上扔下了炸弹,发出轰隆一声巨响,防空洞顶的泥沙也震动下来。因为没有装电灯,洞里漆黑,人群不明方向,在洞口的往里挤,在里面的又往外挤。这时,又响起了周恩来宏亮的声音:“都不要动!安静!”这声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们的情绪。敌机又扔一颗炸弹,防空洞又被震掉掉下一些土块,但这会儿人们就都一动也不动了。

敌机飞远后,周恩来走出洞口站着,对大家说:“再耐心等一等!”直到解除警报声响了,他才让大家有序地出到洞外,还挨个清点人数,确认没有伤一个人全都安全才放下心来。

这一时期,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时评《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指出:“更积极的更紧张的抗战工作,这是对于我们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的回答。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来把日寇消灭在它垂死前的疯狂挣扎中!”同时《新华日报》在《以胜利回答敌寇轰炸》一文中,向重庆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发出庄严又坚决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敌寇残暴的轰炸面前消沉屈服!敌机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摧毁我们的肉体,消灭城市的繁华,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坚强团结抗战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的外力,能够一丝一毫地动摇我们抗战和胜利的信心。我们坚决用最大的力量,来坚持抗战,巩固团结,使民族解放这个全民的伟大事业,真能决定于全民的积极参加。”

在重庆大轰炸的血与火中,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广大党员战斗在红色三岩,和重庆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起,勇敢投入反空袭、反轰炸的斗争中,用实际行动模范实践着这两个“回答”。



# 张爱萍的《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

张秋兵

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我上任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来电话找我去谈工作。此后,我便常常在夜里接到他的电话后,从小山坡走向他那间闪烁着熠熠灯光的小屋去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他一起迎黎明。

“常忆征途亲指领”是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抗战时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55年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在北京,“我受到周恩来同志亲自教诲指导”。1938年3月初,周恩来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并说:“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说服李宗仁先生。”张爱萍到徐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李宗仁于5月23日发起了台儿庄大战。1964年,李宗仁回国后,在陈毅元帅招待的一次宴会上,还记起了当年周恩来派来的这位八路军高参。

“挺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是指:“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为了完成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艰巨任务,他集中了一大批组织者和实干家,把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们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难题,使他们各得用武之地。”1962年11月,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委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专委会主任为周恩来,专委会成员共十五人包括张爱萍。中央专委会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1964年10月16日,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在试验场向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电话报告:“核爆炸成功了!”这天,张爱萍填写《请平反·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后来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文革中,张爱萍在关押期间跌断了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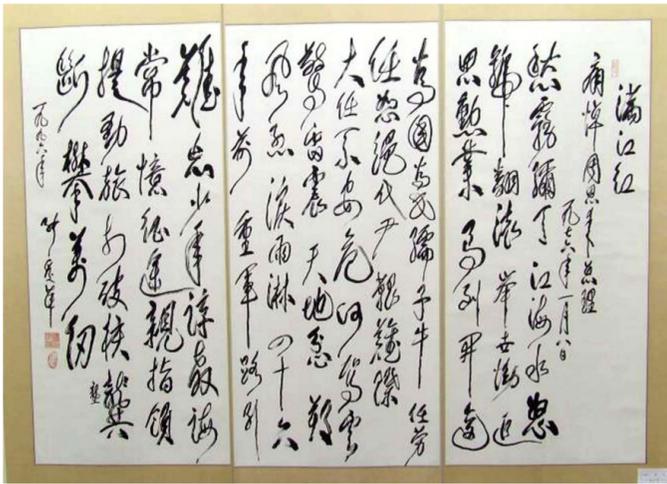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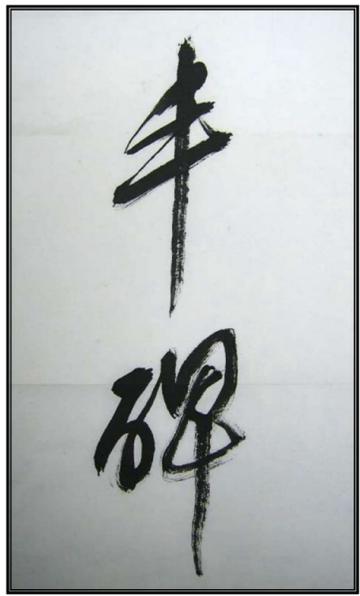
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恩来向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6年1月8日原定对张爱萍的批判大会因周恩来逝世而取消。张爱萍后来曾经说:是总理在保护我,用他的走来免除我的一场灾难。然而,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总理的健康。《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既抒情,又怀旧;既抒发了对周总理的情感,又艺术地再现了与周总理的交往经历。7月7日,朱德逝世,张爱萍又赋诗《悼念朱总司令》。这一词一诗都“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诗风“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都是时代的折光、历史的回声。

1976年,《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并未公开,公开并且流传甚广的是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总作》(作者不详),该词与“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泪洒雄杰,扬眉剑出鞘”都被编入了供毛泽东看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

张爱萍曾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任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其“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位于苏北平原的淮安既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张爱萍在淮安战斗了三年,还拍摄了大量照片。1992年,周恩来纪念馆在淮安建成开放。张爱萍一生没有来过纪念馆,但对纪念馆帮助很多。1992年初,纪念馆征集到一份1934年的文献,全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文末署名是:“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纪念馆研究人员秦九凤设法与张爱萍联系,张爱萍嘱秘书先后回了2封信,介绍了这份文献的来龙去脉。1995年,

这份文献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1988年,周恩来故居和淮安(县)文联联合征集书画作品,张爱萍书写了《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并寄给淮安,但却杳无音讯。1996年1月10日,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纪念馆又收到了86岁高龄的张爱萍重新书写的《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为了怕邮寄丢失,这次是派两位武警携卷直接送到淮安。1996年,纪念馆创办了馆刊《丰碑》,张爱萍为之书写了“丰碑”刊名。



张爱萍将军多才多艺,擅书法、好摄影、工诗词,尤其诗词成就最高,按其自己的话来说是“闲情自得好打油”。1991年出版的《神剑之歌——张爱萍诗词、书法、摄影选集》就选收诗词260余首。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珍藏着张爱萍1996年书写的一幅行草《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该词的内容却是写于1976年1月8日。那天,国防科委及七机部要召开8000人大会批判张爱萍,结果批判会没有开成,张爱萍怎么也想不到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便在301“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了一首《满江红》为他送行”:

愁雾弥天,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追思劫业,马列开道。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艰难险,大任系安危,何驾云!  
惊雷震,天地念,朔风烈,泪雨淋。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挺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  
张爱萍填词《忆秦娥》最多,至少有五首,而《满江红》共有三首。早在1951年4月14日参观杭州西湖岳庙后就填词《满江红·岳庙》。1965年元旦在榆林港填词《满江红·游天涯海